

从新劳动探索数字智能时代的社会状况^{*}

贾文娟^{**}

摘要:本文试图从劳动与技术关系、权力关系、脱嵌与整合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化对数字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解。在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的关系转变成为人机交互,“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反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技术对象。从权力关系上看,韩炳哲所述的精明权力正在替代福柯所述的规训权力,以劳动者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或明显或隐匿的支配。与此同时,数字智能技术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持续深化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社会再次面临着脱嵌的危机。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 20 世纪的覆辙,亟待思考与解决。

关键词:人工智能 认知劳动 技术与劳动 主体性

在去全球化的当下,人类似乎正在努力借助数字智能技术走出以灵活积累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并走向一个更高水平的新纪元,但其前途依然晦暗不清。与曾经的工业化进程类似,目前的数字智能社会并不是由新技术、新传播方式、新生产方式、新社会关系构成的统一体,而是新的技术方式与业已存在的社会文化、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方式相互交织融合的复杂产物。其内部可能既不统一,也不匹配,各要素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与重构,其权力运作逻辑、社会整合逻辑、冲突与妥协模式超乎想象地微妙和复杂。在现实面前,人们常谈的“赛博朋克”(Cyberpunk)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隐喻,呈现出数字智能社会的一角。

若要理解数字智能社会的全貌,我们仍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回归现实生活本身。人民大众要生活,劳动是必要条件。马克思思基于这条真理,从生产与再生产两个角度入手,对人们在不同时代的劳动生活方式进行了研究,继而阐释了特定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延续状况与变革动力。据此,本文将讨论四方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产业中的算法劳动与劳动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CSH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贾文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面的问题:第一,我们可以从劳动的角度提出怎样的问题,以深化对数字智能时代的理解?第二,在数字智能时代,人们用以构建其基本社会生活的劳动方式,亦即其生产劳动的具体技术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在新劳动方式下,数字智能时代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运作逻辑与以往时代有何不同?第四,数字智能时代的社会脱嵌与再整合关系又是怎样的?在今天探讨这些问题,对个体在不确定的时代重建自己的生活,以及对我国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下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劳动现象研究的理论视角与问题意识

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数字智能时代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工业时代并不相同,福特主义模式下劳动方式与生活状况的确定性、稳定性已经被偶然性、变动性所代替。面对数字智能时代劳动生活的新状况,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本部分将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人类学等较有影响力的理论视角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劳动角度研究和理解数字智能时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旨趣。

第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资本积累逻辑的新变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以极为敏锐和超前的视角,从资本循环与积累的特征入手,捕捉数字化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根本特征。比如,福克斯发现,数字资本通过使用免费的数字劳工,攫取着人们的脑力、体力与创意(Fuchs, 2014);莫斯科分析了新一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是如何用于资本增殖、战争威胁,而非用于提升社会福祉和人民的民主参与的(Mosco, 2017)。学者将新闻学对媒介的关注与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积累逻辑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既阐述了数字智能社会中劳动区别于工业社会的划时代变革,又讨论了这些社会模式在剥削与反抗关系上所具有的延续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劳动看作使资本流通与循环得以继续的重要环节,尤其关注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融合对资本积累策略和效率产生的重要影响。当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劳动工作与娱乐生活的边界在时空维度都被打破后,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出现了。数字智能时代的商品不仅是物质性的,还包括各类“内容”、文化产品、商业服务、ICT 软件等在线生产的非物质产品——其中有些恰是人们“摸鱼”时所使用的。这类商品的生产不再依托固定生产线,而是依托

涵盖大公司雇员、网民、玩家、众包生产者等在内的数字劳工,人们劳动的动力也不再是对饥饿、惩罚的恐惧,而是对消费、休闲、游戏、社交的欲求。由于非物质产品的消费与交换可以在虚拟世界进行,各类金融信贷产品借由平台与消费绑定在一起,资金的流动速度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消费—交换等环节之间相互交融的状态,为剩余价值的获得设置了障碍,促使资本采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区块链、众包等新组织形式,使用大量按需工作的数字零工进行劳动,并以游戏化、娱乐化、产消合一等新策略对其进行控制。

在当前中国,互联网产业的重要性、增速与规模都甚于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重塑整体社会生活秩序的核心产业。近年来,国内学者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数字信息产业的弹性积累与工业不同,其在使平台用户自由参与信息生产和消费赋权的同时,隐蔽地对用户时间、数据信息、精力情感进行剥削(曹晋、赵月枝,2008)。算法作为一种媒介,将劳动、交通工具、食品餐饮、技术研发、城市物流等组成了结合体(孙萍,2019)。劳动力的价值不仅表现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还表现为其对虚拟世界贡献数据的多少(姚建华,2021)。结果,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被殖民化为资本获益的依托;另一方面,人们的劳动时间也随之延长。

第二,劳动社会学与劳动者工作境遇的变化。劳动社会学将劳动方式、劳动者身份地位、劳动体制看作影响社会整合、社会关系再生产,或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并从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劳动认同等角度入手,考察数字智能时代社会秩序是如何被再生产出来的。当然,数字智能技术不仅催生出了新的产业,也改变了传统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力量。其一,诸如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网络作家等群体的劳动方式得到了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依托信息技术,平台实现了对于数据收集和任务分配的垄断权,其一方面借助智能语音助手规划路线、简化操作,实现对骑手的去技术化(冯向楠、詹婧,2019);另一方面将数据用于制定时间标准和量化绩效管理上(陈龙,2020)。掌握控制权的平台在表面上放弃了直接控制,实则引入消费者等主体对劳动者进行评价,淡化雇主责任并转嫁了劳资冲突(陈龙,2020;梁萌,2017)。此外,平台还会通过“梦想”的机会制造和分类签约、竞争激励和内容管理等技术控制,重建劳动价值体系,使网络作家积极地参与到自我规训的生产过程之中(胡慧、任焰,2018)。在直播

行业当中,平台制造的“人气游戏”通过操控“人气”调和劳资利益,使劳动者忽略了工作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剥削(徐林枫、张恒宇,2019)。其二,传统产业工人的劳动形态与行动方式的变化也得到了关注。今天,中国产业升级中的制造业正在经历以“智能化”和“省人化”为目标的“机器换人”。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使用方式是将核心科学原理、科学思维从知识生产的基本技能中抽离,这令工程师陷入了“技术空心化”的境地(王潇,2019)。“机器换人”使劳动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劳动控制更为强化,以及工人愈发成为仅能承担“执行”作用的被动劳动者,最终将带来劳动力结构的两极分化(许怡、叶欣,2020)。传统产业工人在生产中的自主性更低了,中低技术工人甚至可能被抛出制造业(孙中伟、邓韵雪,2020;张桂金、张东,2019)。

第三,劳动人类学与劳动生活的内容。劳动人类学者并不认为数字智能时代的人类劳动与以往存在质的变化,而认为人们今天的劳动状态依然是以往的延续。格雷与苏里在学界对不稳定劳动研究的基础上,从“幽灵工作”切入,讨论今天人工智能产业中劳动者工作状态与以往的连续性。他们认为,人工智能存在“自动化最后一公里”的悖论——那些标榜能够替代人类的“自动化体系”反而需要借助大量不被看见的“幽灵工作”,才能正常运作。在19世纪匹兹堡的纺织厂,雇主开始使用新机器后,需要雇佣大量家庭工厂中的按需工人来缝制花边;20世纪70年代,IBM计算机的运作与航天飞机的升空都需要大量黑人女性计算员来检查结果的可靠性。今天的情况也类似。人工智能企业使用通用程序接口API将劳动者与计算机连接起来,通过众包平台将位于全球各地的“幽灵工人”都纳入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其承担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结果检查等任务。但吊诡的是,承担按需工作的大量“幽灵工人”是以兼职和合同工的身份存在的,他们隐藏在人工智能的背后,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会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认为其身份地位较低,不可与正式雇员相提并论,继而故意忽视他们的利益(格雷、苏里,2020)。

与此同时,劳动人类学者指出,高科技企业中的诸多正式雇员——尤其是管理人员——从事的则是对他人、对公众、对社会、对世界毫无贡献,对自身毫无意义,但收入颇高的“狗屁工作”(格雷伯,2022)。“狗屁工作”的存在仅仅是权力群体需要被一堆“整体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奴仆’包围,然后听这些马屁精不断想出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对社会是有益的”(格雷伯,2022:11)。

格雷伯认为,数字智能技术并没有使人类社会实现真正的进步,大型科技公司反而采取了“管理主义封建制度”(格雷伯,2022:282),动摇中产阶级“自我意识的根基”(格雷伯,2022:100)。与此同时,大公司却不愿意为真正有意义的智识工作和照料工作买单,那些往 Github 等开源社区上传最新算法模块和借助众包平台进行按需工作的数字劳工在经济上缺乏收获。

实际上,从西方语境下看,无论是“幽灵工作”还是“狗屁工作”都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指向。今天,欧美国家和印度、菲律宾等全球南方国家工人阶级的最重要构成部分便是科技工人。“幽灵工作”“狗屁工作”概念的提出,一方面让承担按需任务的众包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是智能时代无可或缺、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让拥有固定工作的管理人员意识到,自己看似优渥的工作如此无用和不堪。此后,各种各样的科技工人开始汇集在一起,在工会的推动下,要求和科技公司进行集体谈判。目前,科技工人已经在谷歌和亚马逊成立起工会。

综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人类学在延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上,分别从资本积累的逻辑、劳动控制的策略、劳动生活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对数字智能社会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不管技术变迁如何复杂,诸如积累、劳动、工作依然是用以认识数字智能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理论设定的概念和路径下,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回答。我们如何从技术角度思考当下的劳动与社会生活状况,以深化对数字智能时代的认识,需要更多的研究。

二、技术与劳动的交互与融合

与工业时代、服务业时代相比,数字智能时代的劳动方式、劳动关系是怎样的,该时代的权力运作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逻辑又是怎样的,构成了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据此,我们试图追寻的并非对特定管理手法的“碎片化收集”,而是在充分研究各类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对特定技术时代“社会运行机制”的整体性把握。

从这个目的出发,“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等概念已经不足够了。具体而言,非物质劳动是指用以生产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信息等非物质成果的劳动(哈特、奈格里,2008)。该概念指向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商品与劳动“脱实入虚”

的取向(Boutang, 2011)。然而,该概念一方面内涵过于狭窄,强化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对立;另一方面外延过大,忽略了脑力劳动者内部的差异,难以锚定数字智能时代人类劳动方式的独特性。数字劳动是指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工作(姚建华, 2021:18)。该概念一方面指涉了“劳动的媒介化”,即骑手、网红等劳动者成为科技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媒介,另一方面指涉了“媒介的劳动化”,即受众对互联网、APP等加以使用的媒介行为成了为科技公司生产数据、流量和创意的劳动,继而揭示了数字资本运作的隐匿逻辑。但是,数字劳动并没有对劳动过程背后的人机关系、权力关系进行深挖,继而难以对数字信息时代与数字智能时代背后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劳动方式加以区分。比如,该概念无法对富士康工人与数据标注员这两种不同简单劳动背后的差异进行说明,即便二者都有可能以数字劳动的方式在“拼多多”上进行生产性消费。数字时代的依托不仅是信息,更重要的是智能,智能技术将对人类的劳动方式产生极大影响。

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人们看待技术的视角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斯蒂格勒主张,摒弃从“器具论”的角度来看待新技术的方法论立场。他认为,技术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只有“人”才能理解技术,只有“人”才能创造、运用技术。技术就是人类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先决的和内在的条件(斯蒂格勒, 2019)。从这个意义上看,与技术主体相对应的所指不是技术对象或技术客体,而是具有主体性的技术载体。“下载劳动”概念便从数字智能和人类劳动之间的关系入手,对当下的人类劳动方式进行了界定。郑广怀(2021:41)指出:“下载劳动是指互联网平台作为巨大的具备反思能力的实践,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工人固有的主体性。”下载劳动是通过更强大的技术监视、与人类自身需要更契合的社会规范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依然是主体,但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即人机关系发生了转变。在工业时代,死劳动需要活劳动的使用和激发才能发挥作用;到了数字智能时代,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随时监控和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地发挥主体性,继而创造价值。前者的核心在于使劳动者成为与机器一样的客体,常被称为“人机合作”;而后者的核心在于使机器成为与人一样的主体,常被称为“人机交互”。

数字智能社会的运转不仅需要技术的使用者,更依靠技术的生产者——他们是为前者构建“大他者”的劳动群体——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枚硬币的正反

两面。然而,学界对智能技术生产者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欠缺。据此,笔者通过对人工智能产业中数据标注工作的调查发现,如果说数字智能使用者的劳动是下载劳动(郑广怀,2021),那么数字智能生产者的劳动便是以上传为主的认知劳动。无论智能汽车的自动导向系统、短视频背后的推荐系统、网约车司机的接单系统,还是智能语音、翻译工具的识别系统,都是需要人手输入代码和数据的。认知劳动是指“人们策略性地施展、调用或抽取各种认知能力,在人机交互过程中生产人工智能程序的劳动”(贾文娟、颜文茜,2022)。数字智能生产者的人机交互与其使用者不同,它是劳动者发挥其识别、判断、理解等人类认知能力,再以二进制代码的方式输入电脑的过程,其核心是使劳动者进行三个环节的认知系统转变:第一,思维模式的转变。为了适应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劳动者需要将其以经验直觉为认知基准的人类思维模式转变为与电脑硬件系统相匹配的“产生式思维”模式。第二,思考逻辑的转变。为了适应计算机的数学运算策略,劳动者需要将自动化乃至无意识的思考方式转化为数学式、程序性、步步衔接的思考方式。第三,语言语法的转变。为了与计算机符号识别模式相适应,劳动者需要将人类的自然语言转化为计算机的代码语言。认知劳动者非常多元,包括计算机科学研究者、机器语言开发者、大公司的首席软件工程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算法程序员、测试员、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查员等,但都需要进行认知系统的转换。与此同时,认知劳动的分工逻辑也走向了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认知劳动同样呈现出去技术化的发展趋势。当架构师运用战略性思维,为特定问题求解提供整体性方案、对智能系统进行整体设计时,数据标注员使用的仅是最基本的“刺激—反应”机能。对数据标注员而言,计算机硬件系统——作为“死劳动”——依然构成了对“活劳动”的支配。

将数字智能技术使用者的下载劳动与生产者的认知劳动结合而观之,可以发现,完全将 AI 算法看作“大他者”并不准确。它是由人工智能生产者的人类认知凝结而成的“死劳动”,这套规范化的策略与认知从设计者头脑中上传到机器,再经由 APP 等程序被下载到执行者的头脑中。这些比流水线更加鲜活的“死劳动”在对“活劳动”进行指导的过程中,与其结合在一起,重塑和取代了劳动者固有的主体性,继而使后者创造出了更多价值。

三、从规训性权力到精明的权力

通过对“技术与劳动”交互方式的阐释,我们便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人机交互背后的权力运作方式了。实际上,不少学者都对数字智能时代权力运作的机制进行了深入阐释。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哈特与奈格里对“诸众”所具有的对抗全球化政治秩序的潜能的呼唤(哈特、奈格里,2015)。与此同时,伴随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再一次被看作权力运作的核心逻辑。但是,笔者在对传媒实习生的娱乐劳动、数据标注员的认知劳动,甚至临床试验受试者的技术行为进行研究时,对“生命政治”的体会并不直接;与此相反,和情感、认知、意义、价值等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却几乎存在于权力现身的各个场所中。权力支配策略已经发生了以下三方面的转变:

第一,从以身体为核心的支配策略转变为以认知为核心的支配策略。心理学意义上的认知指的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刺激—反应”机能,而且指人类独有的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包括知觉、表象、记忆、观念、概念、理解、策略、计划等。人们通过对认知能力的发挥,构建起对世界的理解与感受,开启了自我与世界的互动,并生发出了人的情感、行动的价值与生活的意义。特定的认知能使人们获得积极行动的力量、蓬勃发展的朝气、乐于奉献的慷慨精神,以及承受克服艰难困苦的毅力和勇气。据此,对特定体验、价值、意义的构建,便成为权力运作的核心逻辑,即便是看似与“生命政治”最契合的临床试验领域也是这样的。笔者发现,无论是参与Ⅰ期和BE临床试验的健康受试者,还是参与Ⅱ—Ⅲ期临床试验的患者受试者,他们都参与到了对临床试验的价值与意义的解释中去,并将健康受试者临床试验理解为身体物质的交易,将患者受试者临床试验理解为播撒希望的福利。虽然各种与时间、空间、血液抽取、身体姿势有关的规训技术存在于整个过程中,但迫使受试者就范的显然不是技术权力及其各种制度规则,而是行动者出于特定理念、价值与意义而自愿成为医学技术的对象(贾文娟、杨玲荣,2021)。为了支配,权力所要克服的不再是来自肉体的直接反抗,而是去优化心理、精神和脑力的运作方式,提前排除可能存在的任何隐患。斯蒂格勒在《从生物政治到精神力量》一书中曾指出:“我觉得,福柯……以令人信服的口吻描述的生物权力,与对当今时代有深刻影响的权力并不是同一种权力。”(Stiegler,

2009:49)。他认为,心理技术正在取代生物权力的位置,人们从自身的愿望出发,通过积极行动、社会赋义等方式,构建出他们所能接受的权力支配方式。当然,数字智能时代出现的智能手机、各类平台和 APP,便是这种权力支配方式的载体与媒介。

第二,从基于利益分配的支配转变为打造幻象的支配。从世界发展历史上看,数字智能的时代同时又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以纳斯达克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既为数字智能时代提供了巨大发展动力,又为身处该时代的组织与个体制造出相比以往时代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投资的核心对象便是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大数据等在内的高科技企业,但这个新市场是个易进易出、大起大落的市场。科技公司的纳斯达克淘汰率极高,曾经叱咤风云的网景公司只在纳斯达克存在了四年。在一个股东价值导向的时代,当企业以频繁的兼并重组来提振股价之时,普通劳动者则处于随时可能被清算的危险境地(何柔婉,2018)。与此同时,劳动力蓄水池也在被持续扩大。大量的高校毕业生、被裁员的企业员工、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不稳定劳动者则成为劳动力蓄水池中的新成员,他们身处恐惧之中,时刻为下个月的房租忧虑。这种始终存在的焦虑感让劳动者孜孜不倦地去工作。然而,这种深层、无法被克服的恐惧并不能被提及,它只能被娱乐、游戏的幻象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智能时代中的公司采用股权激励、招募实习等方式来减少对劳动者的物质经济偿付,并通过构筑幻象的方式来提升劳动者的热情,使其在薪资极低的情况下,依然自愿投入到高强度的劳动之中。齐泽克(2002:224)指出,幻象的存在暗示出了劳动者对其本质的非知,它是使人们面对混乱不堪、难以预测的世界而不至于陷入绝望的一套理解。笔者在对传媒实习生进行研究时发现,管理方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氛围营造等方式强化着实习生的感官享受,引导着他们的情感,而不必支付他们多少薪酬。实习生越是对未来充满恐惧,对就业存在担忧,就越愿意投入到管理方打造的娱乐中去。娱乐幻象——同时作为一种逃避不确定性的方式和努力工作的方式——构成了对劳动者的支配(贾文娟、钟恺欧,2018)。据此,从利益分配到打造幻象,权力利用人的希望、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实现了支配。

第三,从僵硬的控制转变为精明的整饰。我们需要深刻意识到今天的权力运作逻辑与工业时代的不同。实际上,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关注的依然是工业时代的状况,而数字智能时代与其存在一定的差异。始于工业时代的规训权力总

是呈现出否定性的姿态,它试图使用规范、制度、约束将劳动者置于封闭环境中,严格限制劳动者使用时间和空间的方法。诸如流水线工人等劳动者不得不在预装的空间内活动——工厂的窗户被封死、大门被上锁——因而屈从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但是,骑手的劳动方式则与此不同。他们可以自由处置 APP 所发出的指令,按照自己认为的最优路线前进,并生产出新的数据,最终推动系统实现迭代升级。郑广怀将这种技术支配逻辑称为“常态规范”,并指出“常态规范”是一个不同于“确立规范”的去中心化的规范形式,它不要求祛除劳动中的不确定性,而试图去认识和利用劳动者的主体性;冲突与反抗不再被视为难以克服的问题,而成为一种不好的状态,是可以得到调整的(郑广怀,2021)。与此相应,人工智能产品生产方的管理方式正在从僵硬的身体控制走向精明的认知整饰。在对数据标注员认知劳动进行研究时,笔者发现管理方会以极大的耐心紧盯劳动的各个环节,并运用各种心理学知识来监督劳动者进行认知系统的转换。其中,以实践共同体为基础的交流、讨论与反馈得到了高度重视——管理方不仅会要求数据标注员随时发挥自身的反思能力,及时发现认知偏误,而且会推动后者随时与管理方进行沟通,向其反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与流水线的身体控制相比,认知整饰是极为精明的,培训学习、沟通交流等与认知学习相关的柔性策略被使用,管理方在与劳动者的合作与交流中,恩威并施地消除人们的认知偏误,回应劳动者的质疑,接受他们的建议。而劳动者,也被要求具备很强的开放性,敢于打破疆界和束缚,帮助管理方探寻更好的解决方案(贾文娟、颜文茜,2022)。规范的存在意义发生了转变。在数字智能时代的劳动中,规范本身并不清晰,劳动者不认可规范也没关系,他们会被鼓励参加到“何为规范”“如何规范”的讨论中去,对规范进行修改,以使规范权力能够更好地实施。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智能时代的权力运作方式正在从僵硬的控制走向精明的整饰。

综上,在数字智能时代,福柯式的生命政治正在变成《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红桃皇后”的叫喊,人们能够确切感受到权力通过数字技术向身体施加的种种规训,继而产生了对权力的惊觉与不满,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权力的运作效率。正如韩炳哲(2019:19)所说:“权力毫无疑问就存在于人们不刻意关注它的地方。权力越大,就越平静。”规训权力在未来能够发挥出多大作用,已经令人生疑了。在数字智能时代,另一种权力正带着自己隐藏的愿望、需求和渴望进入更深层的精神层面,它合乎劳动者的心意,展现出友爱的面孔。权力所要建构的

不是“屈从的主体”，而是“自主的客体”（韩炳哲，2019：1）。其反讽之处在于，恰是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与自主性，使其能够接受作为“技术对象”的命运。就像马克思曾指出的，恰是儿童灵活的手指与身躯，使他们在 19 世纪成为承担某些最为危险的劳动的最佳人选。人们通过自主性的发挥，成为技术权力的最佳客体，最终使更趋近于人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利用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哈特与奈格里所呼吁的“诸众”对“帝国”的反抗似乎仅存在于想象之中。数字智能时代的劳资关系同样呈现出资强劳弱的态势，但个体化的劳动者很难团结起来，承担终结由金融资本与数字智能技术构成的“利维坦”的使命。

四、社会脱嵌与再整合的再现与未来

众所周知，金融资本与数字智能技术的叠加并没有将劳动从过度商品化的境地中解救出来，而是将其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全球金融市场相比地方性的商品市场，更加脱嵌于社会与具体文化情境。没人能预测下一个利润增长点在哪里，没人知道消费者接下来将为什么而疯狂。然而，脱嵌是一种能够带来不安与不确定的状态。人们对当下和未来形成确定认知，以构建自己的稳定生活状态，而不至于陷入焦躁不宁与惶恐不安之中。基于此，劳动者、组织与社会都以各自的方式推进“再整合”的进行。接下来，本文将讨论脱嵌与再整合在劳动者身上、企业组织中以及整体政治经济中的表现，并思考其可能导向的未来。

第一，脱嵌与整合的逻辑在劳动者身上表现为通过流动谋求稳定。从全球范围看，尽管我们与波兰尼所处的时代已经大为不同，但是奉行灵活积累策略的新自由主义再次将劳动者从工会和国家的保护下分离出来，重新面临脱嵌的境况（哈维，2010：193）。平台经济孕育的零工工作使得大量的劳动者成为新型不稳定无产者，面临碎片化的、缺乏保障的工作状态（姚建华，2018）。面对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劳动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认知，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投入劳动生活中。研究者指出，诸如程序员等高技能劳动者，在面临过度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双重就业风险时，被迫将自己视作企业，并以市场理性经营着自己的劳动生活（严霞，2020）。笔者也发现，数字智能产业中的劳动者应对不稳定劳动的方式反而是更加主动的流动。比如，程序员就试图在频繁的流动之中应对不知源自何处的不确定性，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他们像拳击运动员一样，在频繁的跳动

中避开对手的攻击。此刻,吊诡的是,流动本身正在成为确定的方案和稳定的状态。

“通过流动谋求稳定”的策略不仅影响了劳动者在劳动场所和劳动力市场中的行动方式,也影响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流动状态使得劳动者的生活空间变得碎片化和个人化,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国家及其合法性认同正在走向衰落(卡斯特,2006:71),“个人化的社区”出现了(卡斯特,2007:140)。再生产环节的个人化不仅降低了劳动者抵抗资本主义秩序的能力,也让认同变成了近乎唯一的意义来源和组织来源(卡斯特,2001:3)。今天,“点赞”就像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说“阿门”,智能手机成为劳动者的移动告解室(韩炳哲,2019:17)。如同劳动场所和劳动力市场一样,人们也用流动的心态对待再生产领域,依据认同构筑流变的社区,使得“流动就是稳定”的信念贯穿劳动者生命的各个过程。

当然,不稳定的、流动的劳动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并非数字时代劳动力再生产环节的终点。劳动者不仅脱嵌于以社区生活为核心的传统共同体,而且经由产消一体的生产模式被整合到资本增殖的逻辑当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指出,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化,休闲娱乐也变成了资本积累的新源泉,“玩工”即文化消费品的爱好者和消费者的无酬劳动为资本创造了价值(库克里奇,2018)。此外,笔者发现,在中国社会情境下,管理方还可以通过游戏工作化的方式,通过塑造职业认同、提升玩家的身份地位,来强化“玩工”对劳动工作的参与(贾文娟、曹思洁,2022)。与此同时,基于认同的虚拟社群也被资本组织起来,用以推动资本激烈地继续发展。比如,与以往的追星族不同,个体化、分散化的粉丝被资本组织了,被重塑为既具备圈层化等级和专业分工等组织特征,又依托于个体感情和不断流动的“饭圈”(毛丹、王敬雅、陈佳俊,2021)。“饭圈”映射出在数字智能时代,个体化的产消合一者是按照资本所需要的逻辑被进行社会再整合的。结果,人们在资本的作用下,在劳动之中遭遇了脱嵌与个体化,又在资本的组织下以消费者的身份被整合在一起,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

第二,脱嵌与整合在企业组织中表现为对劳动力再生产设施的打造。脱嵌与整合的逻辑同时也表现在企业的组织之中。波兰尼(2020:171)认为,作为价值产生来源的人的劳动本身是嵌入在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非契约关系之中的。然而,随着自由市场的出现,冰冷的契约关系逐渐取

代了传统的非契约关系,使得劳动者陷入了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中,促成了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出现(波兰尼,2020:184)。在二战后的工业社会中,资本通过构建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方式来缓解工人与管理方的矛盾(布若威,2008:110)。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灵活积累体制的崛起,劳动者与社会的脱嵌再次加深了(哈维,2010:195)。

进入数字智能时代,即便是企业也面临着如何将脱嵌于原有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重新整合入新的社会关系中的难题。在当今的人工智能企业中,大部分的劳动者都来自国内的二、三线城市。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使该群体不得不生活在逼仄的出租屋中,巨大的工作压力挤占着他们的休息时间,频繁的跳槽则使他们难以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在狂飙式发展的大城市中,人工智能企业中的普通劳动者们陷入了一种个体化且孤独的状态。

个体化且孤独的状态并不利于人工智能企业激发并获取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据此,人工智能企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试图在企业内部重建社会团结,将劳动者整合到适应生产发展的新社会关系中。今天,不少企业通过给员工免费提供多样的饮食以及下午茶,满足劳动者对于健康饮食的需求;通过在公司中设立健身设施,缓解劳动者因久坐带来的身体损耗;通过开展谈心活动、午间小游戏和团队建设,为劳动者找到情感上的寄托。在上述方式下,大城市中的劳动者被再整合进企业为其构建的社会关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脱嵌与整合在整体政治经济中表现为金融的去管制化与风险频出。新技术曾被寄希望于通过快捷的信息反馈降低生产的盲目性,然而技术本身却受到了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干预和影响(贝尔,1985:125),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结合反而扩大了社会风险(乔晓楠、郗艳萍,2019)。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劳动者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当技术逐渐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时,更多隐蔽的剥削形式被制造了出来(姚建华、徐婧,2017)。

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结合增强了资本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并深刻影响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信息技术与新型融资形式促成了金融脱媒。金融不再需要依赖于银行等机构,具备极强灵活性的金融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在全球范围内频繁、短期流动,投资越来越投机化(杨典、欧阳璇宇,2018)。为了适应金融资本在高速流动当中实现增殖的逻辑,企业也必须通过裁员重组实现组织结构精

简化(杨典,2018),企业与劳动者被迫承担金融风险 and 不确定性。

智能时代的技术与政治经济还存在更复杂的关系。国家面临着不干预市场运作与维护市场环境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国家往往选择采取积极的手段保护金融信用、打击工会并与商业集团合作(哈维,2010:90-92)。在智能时代,国家协助大型科技公司将工作、生活的行为规范扩展到全社会,并通过制造“高技术”工作与“过时”工作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将传统工人置于社会经济政治的从属地位,放任两类工人面对不确定和专制的工作环境,由此形成了科技国家资本主义(Ya-Wen, 2022)。一方面,国家配合科技资本放大了劳动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国家本身也面临着经济增长与合法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加强了社会整体的不确定性。

“脱嵌”的自由市场给社会带来的张力将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打击,并将引发社会对自身的保护运动(波兰尼,2020:255)。在数字智能时代,各类外在环境的变迁会更快、更不确定,人们的生活方式频繁受到冲击。从美国的通货膨胀到俄乌冲突都在提醒人们,在变动的时代维持自身生活稳定性的困难能有多大——遑论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在不确定性的巨大压力下,新时代的反向运动也在蓬勃发展。根据波兰尼(2020:240,243)所述,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存在朝向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今天西方国家的产业工人阶级不断地重塑自身、重建团结,试图通过阶级政治的方式恢复社会秩序。跨越企业和媒介的联合工会和行业协会在新媒体的协助下兴起(Mosco, 2008),依靠信息享有和精通媒体运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进行了抵制(Hackett & Carroll, 2006)。媒介提供了信息沟通和引起注意力的空间,并促成了社会运动的形成(Saeed, 2009)。隐藏在人工智能产业下的“幽灵工人”也积极地通过建立协调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减少重复工作并尝试重建工人团结(格雷、苏里,2020)。

然而,重建工人团结并非唯一运动,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也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蓬勃发展。为了改变混乱的状态,新保守主义强调秩序与道德的力量,反对民主,崇尚精英政治,通过治安和军事手段维护社会秩序(哈维,2010:95)。过去维系公民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认同正在日趋衰弱,而基于抵抗性认同的防御姿态的政权正在不断兴起(卡斯特,2006:330)。在两个趋势的共同影响下,激进的、威权的政权不断煽动民族主义和排外运动,甚至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缓和国内危机,最近的一些国际冲突正是这一趋势带来的直接结果。回首 20

世纪初期,市场经济的崩溃给全球各民族带来了极权主义与战争灾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在数字智能时代引发的新一轮全球社会脱嵌危机中,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是亟待我们认真思考并立刻着手解决的问题。

五、余论

以数字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与生产力变迁正在推动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新一轮的变化。技术与劳动、权力与支配、脱嵌与整合依然是从劳动社会学角度理解数字智能时代的核心议题。首先,从技术与劳动角度看,工业时代的技术器具论在今天已经不足以解释数字智能技术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了,劳动者与技术愈加深刻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是人的生成物,是物化的人,进入数字智能时代,虽然技术依然是“死劳动”,但它愈加趋向于拟人化;另一方面,劳动者又彻底变成了技术的载体与客体。然而,劳动者只有在频繁的沟通交流中与意义构建中,充分发挥出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才能成为技术与资本的合格载体。其次,从权力与支配角度看,数字智能时代的控制议题不再是如何通过强化对劳动者身体的规范,使其遵从资本的规则与指令,而是如何让人们通过发挥其主体性和自主性,自愿地屈从于环境的威力法则(韩炳哲,2019:22)。布雷弗曼(1973)认为,管理方以精细化、标准化和数量化为特征的泰勒制来消除劳动的不确定性。今天,在人工智能产业的认知劳动中,劳动力的不确定性无法被祛除,也无须去祛除,管理方要做的是引导劳动者将这种不确定性运用到增加产出上。劳动者围绕认知规则的讨论,能够使认知规则更清晰;劳动者相互之间的争论,是使他们达成一致所必需的。与认知心理学相关的一系列整饰策略得到了应用。在以往,工人的肉体被塑造成为适应特定生产的对象;今天,劳动者的认知与心灵被塑造为适合满足特定生产需要的载体。一种精明的权力正在替代曾经严肃的规训权力。最后,从经济社会的脱嵌与整合关系看,数字智能时代的市场行动更深刻地脱嵌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且正在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危机,令不少劳动

者处于过劳、失业、贫困等困境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应如何更好地了解全社会劳动者的愿望,保护和提升全体人民的实际利益,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数字智能时代实现迭代升级,继而进入新境界的关键。

参考文献

- 贝尔,丹尼尔,1985,《后工业社会》,彭强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 波兰尼,卡尔,2020,《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 布雷弗曼,哈里,1973,《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布若威,迈克尔,2008,《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曹晋、赵月枝,2008,《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第5期。
- 陈龙,2020,《“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冯向楠、詹婧,2019,《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平台劳动过程研究——以平台外卖骑手为例》,《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 格雷,玛丽·西达尔特·苏里,2020,《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格雷伯,大卫,2022,《毫无意义的工作》,吕宇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哈特,迈克尔、安东尼奥·奈格里,2015,《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哈维,戴维,2010,《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韩炳哲,2019,《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何柔宛,2018,《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翟宇航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胡慧、任焰,2018,《制造梦想:平台经济下众包生产体制与大众知识劳工的弹性化劳动实践——以网络作家为例》,《开放时代》第6期。
- 贾文娟、曹思洁,2022,《游戏工作化——身份获得与“玩工”劳动的支配逻辑》,《社会学评论》第10期。
- 贾文娟、颜文茜,2022,《认知劳动与数据标注中的劳动控制——以N人工智能公司为例》,《社会学研究》第5期。
- 贾文娟、杨玲荣,2021,《向死而生:新药临床试验过程中的自利逻辑与社会赋义》,《社会发展

研究》第4期。

贾文娟、钟恺欧,2018,《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社会学研究》第6期。

卡斯特,曼纽尔,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卡斯特,曼纽尔,2006,《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卡斯特,曼纽尔,2007,《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郑波、武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库克里奇,尤里安,2018,《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姚建华、倪安妮译,《开放时代》第6期。

梁萌,2017,《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毛丹、王敬雅、陈佳俊,2021,《“饭圈”观察: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社会学研究》第6期。

齐泽克,斯拉沃热,2002,《意识形态的崇高载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乔晓楠、郝艳萍,2019,《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第5期。

斯蒂格勒,贝尔纳,2019,《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孙萍,2019,《如何理解算法的物质属性——基于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物质性研究》,《科学与社会学》第3期。

孙中伟、邓韵雪,2020,《“世界工厂”的“凤凰涅槃”——中国制造业“机器换人”的经济社会意义》,《学术论坛》第3期。

王潇,2019,《技术空心化:人工智能对知识型员工劳动过程的重塑——以企业电子研发工程师为例》,《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徐林枫、张恒宇,2019,《“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社会》第4期。

许怡、叶欣,2020,《技术升级劳动降级?——基于三家“机器换人”工厂的社会学考察》,《社会学研究》第3期。

严霞,2020,《以自我为企业——过度市场化与研发员工的自我经营》,《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杨典,2018,《金融全球化与“股东导向型”公司治理制度的跨国传播对中国公司治理改革的社会学分析》,《社会》第2期。

杨典、欧阳璇宇,2018,《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姚建华,2018,《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第3期。

姚建华,2021,《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姚建华、徐婧,2017,《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第3期。
- 张桂金、张东,2019,《“机器换人”对工人工资影响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中国的经验》,《学术论坛》第5期。
- 郑广怀,2021,《从确立规范到常态规范——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控制》,《二十一世纪评论》第10期。
- Boutang, Y. 2011,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 Hackett, R. & William Carroll 2006, *Remaking Media: 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Mosco, V. 2017, *Becoming Digital: Toward A Post-Internet Society*,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 Saeed, S. 2009, *Negotiating Power: Community Media,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 Stiegler, B. 2009, *Von der Biopolitik zur Psychomacht*, Frankfurt: Frankfurt a. M.
- Ya-Wen, L. 2022, “The Gilded Cage: Techno-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Lectur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